

試論李贄「不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」

的觀念史意義

池勝昌

一、緒論

明萬曆三十年，李贄（卓吾，一五二七—一六〇二）在獄中以剃刀割斷喉嚨，拖延數日後，這位宋明思想史上飽受爭議的人物終以高齡黯然離世。然而，圍繞著他的爭論卻未隨著這個舉動而結束。在生前，李贄吸引了衆多的信徒，也招來諸般的指責與批評，即使蓋棺亦無定論，在保守士紳的抵制與朝廷的禁令下，他的朋友和學生依然不停刊刻其豐富的著作，流行的程度甚至有僞託的作品出現。（註一）到了清初，由於明朝的顛覆和學風的轉變，原本混亂的意見爭執遂漸漸沈澱，形成較一致的見解。極具影響力的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就批評李贄：

非聖無法，敢爲異論，雖以妖言逮治，懼而自剄，而焦竑等盛相推重，頗焚衆聽，遂使鄉俗陋翁，翕然尊信，至今爲人心風俗之害。（註二）

與《提要》看法類似的學者更早的還有顧炎武（亭林，一六一三—一六八二）：

嘉靖以後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，始接踵於人間。而王尙書發策謂「今之學者偶有所窺，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，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，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」，此二者盡當日之情事矣。故王門高弟爲泰州（王艮）、龍溪（王畿）二人。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（顏鈞），再傳爲羅近溪（羅汝芳）、趙大洲（趙貞吉）；龍溪學一傳爲何心隱，再傳而爲李卓吾、陶石簣（陶望齡）。昔范武子論王弼、何晏之罪，深於桀紂，以爲一世之

患輕，歷代之患重，自喪之惡小，迷衆之罪大。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，至於焚書坑儒，皆出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。（註三）

顧炎武是清初反王學思想的巨擘，他不僅不滿李贄，批評的筆鋒所及，甚至於王陽明亦難逃指責。至於較同情王學的學者方面，黃宗羲（梨洲，一六一〇—一六九五）以《明儒學案》綜述明代代理學思想時，對泰州王學頗有微詞：

陽明之學有泰州、龍溪而風行天下，亦因泰州、龍溪而漸失其傳。泰州、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，益啓瞿曇之秘而歸之師，蓋躋陽明而爲禪矣。龍溪之後，力量無過龍溪者，又得江右爲之救正，故不至十分絕裂。泰州之後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，傳至顏山農、何心隱一派，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。（註四）

黃宗羲屬於廣義的王學陣營的成員，他面對明清之際濃厚的反王學氣氛時，爲替王學辯護，將陽明學說做較爲保守的詮釋。（註五）泰州學派因持「良知見成」有許多特立獨行的人物，竟遭其貶抑，甚至不冠以「王門」之名，而李贄這麼重要的人物也未入《學案》，用漠視極表其厭惡。

泰州學派與李贄所背負的放蕩、空虛、狂禪的惡名，要到晚清之後才漸有釋除的轉機。由於中西交往日益頻繁，在外交思想的新觀點、視野下，許多過去倍受忽視的學術思想被賦予進步的解釋，泰州學術亦於此流風中被重新評估。例如：與王學素無淵源的劉師培（申叔，一八八四—一九一九）即曾表揚王良具有自立自主的精神，足資逡巡畏縮者憬然自省。（註六）這種趨勢在民國以後的新文化運動中達到高潮，李贄由於強烈批判傳統士紳的虛矯而深受矚目，甚至被捧爲反傳統、反封建的英雄。這些看法持續至一九四九年後的大陸史學界，至今仍有相當的勢力。侯外廬在卷帙龐大的《中國思想通史》中，就把泰州學派所重視的民衆教育和平等的觀念，解釋成具有「反階級統治」的性格，李贄是其中最傑出的一員。（註七）楊天石雖然反對將泰州學派視爲「反階級統治」的學派，卻也主張李贄擺脫「封建道德」的束縛，反對統治者干預社會生活，而具有反孔、反傳統的特質。（註八）

然而，上述的結論已爲晚近的研究所質疑。包遵信認爲包括李贄在內的晚明思想家，雖然不滿於他們的時代，卻沒有能力超越時代的限制，亦未能擺脫傳統是非標準與價值觀念；李贄不遺餘力地抨擊「假道學」，也不過是追慕嚮往「真道學」，並無「反封建」的性格。（註九）大陸地區以外的學者亦有類似看法，黃仁宇、周質平與李焯然等都否定李贄是一反

傳統主義者，而強調李贄複雜矛盾的一面。（註一〇），似乎，關於李贄思想性格的判定問題，類似晚明時代的爭議又再現了。

然而，很可惜的是，黃仁宇等人雖以文獻試圖推翻李贄爲一反傳統主義者的成說，卻未能進一步分析出那些看似反孔、反傳統的言論後，所真正欲討論的思想課題，尤其是對「不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」一語，迄今仍無善解。所以，目前的爭論雖然熱烈，卻並非對話(dialogue)。何以會如此呢？或許是學者未能回溯這句宣言產生的情境脈絡，換言之，未曾回顧李贄與耿定向（在倫，一五二四—一五九六）的辯論所致。本文即擬以李、耿間的辯論爲線索，來探討「不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」的究竟含意，並追尋其觀念史(history of ideas)的背景，以測定李贄是否爲一反傳統主義者。

二、耿李爭辯的源起

耿定向是目前思想史研究領域內十分陌生的名字，日本學者荒木見悟甚至還曾誤認他爲一程朱派的理學家。（註一一）造成這位泰州王學思想家遭受冷落的原因很多，最明顯的有數端：其一，在王學的成員裡，他未有獨創的思想成就，當然難獲學者的青睞。其二，黃宗羲與李贄都指責他的思想、言行並不一致，使後人對其操守心持懷疑。其三，黃宗羲雖承認耿氏對楚中王學的傳播很有貢獻，卻以批判現成良知學的立場，略過其弟子、後學的學行，讓後人難以評考其影響的實情。（註一二）但我們若查考當日的文獻，不難發現耿氏在明末思想界的顯赫聲名：呂坤（新吾，一五三六—一六一八）就曾經說：

周伯時刻意講學，尙是傍人腳跟走，無一副自家天趣，替宋儒添卷案。弟與談論，每多乖駁，大多談本體，宗上乘，不能接引後學。近日多是此等學派，不出姚江、黃安口吻耳。（註一三）

按：王陽明是浙江餘姚人，耿定向則是湖北黃安人。且不論呂坤這段話的用意如何，惟由其將耿氏和陽明並舉，可揣知他在王門中的地位。另外，關於其操守的看法，亦有不同於李贄和黃宗羲所言的記載。屬於北方王門的楊東明（晉菴，一五四八—一六二四）曾說耿氏等「志向高明，品格端正，而列聖賢君子之林者」，在萬曆十五年（一五八八）之後相繼凋零，